

南疆族群认同根源另类探析

热米娜·肖凯提

摘要 形成族群最主要的“边界”不是其语言、文化、信仰等族群“内涵”要素,而是族群存在的“社会边界”。南疆封闭性、板块性的地域特征带来聚居在这里的族群整体生产和生活上的同质性和低差异性,决定了封闭区域内群体社会认知心理的高度统一。恶劣的地理交通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南疆板块性绿洲参与现代化的困难,使得在同一国家制度体系下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本地族群更容易受到传媒的刺激而产生比较性劣势心理而导致认同强化。在社会转型期,比较性的认同强化很容易借助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而转化为群体事件。南疆的发展与应对行为的表现须专门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出南疆发展的科学决策。

关键词 族群封闭;社会边界;认同强化

中图分类号: 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0)01—0038—05

作者简介:热米娜·肖凯提(1983-),女,维吾尔族,新疆和田人,“国家 985 工程 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四川大学宗教与道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宗教社会学。四川 成都 610064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疆社群事件,南疆一直都牵涉其中。为什么一个特殊地域成为某种群体心理上具有的一致性、特定性的社会行为特征?强化南疆族群认同的因素有哪些?在新疆地区的调查研究和研究成果中,我们发现,学者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许多的研究报告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人文、宗教、语言等各个方面论证了维吾尔较高的族群认同意识,但是鲜有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南疆维吾尔族群认同的原因。2、有的学者根据人类学族群认同的要素分析,认为南疆维吾尔族群有较高的族群认同,源于南疆维吾尔人共同的表形、语言、文化、信仰、习俗等因素;加上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多元民族文化的社会环境铸就了维吾尔族的明显的自识心理和明确的自我意识。3、南疆维吾尔族较高的族群认同,是境内外敌对势力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努力强调维吾尔族的民族性特征,强化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在民族文化、表形特征、宗教信仰等上的差异性,在维吾尔族群众造成恶劣影响的结果。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与传统的经验式和定性式的研究不同,这些成果更加注重实证研究,更多的量化研究方法被引入,族群认同的研究方法趋向多样化。但是所有这些量化研究的结果,只是在描述维吾尔族族群认同的要素,或者是在把维

吾尔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做对比,来分析维吾尔族群的特征,以及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对比结果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其次,对于第二种观点,许多的研究都是从族群内部的共同特征,即客观特征出发,即强调了族群的语言、文化、信仰等的特征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忽略了造成族群最主要的“边界”不是其语言、文化、宗教等族群“内涵”要素,而是族群存在的“社会边界”。“族群”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之中,这是当代社会科学家对族群研究达成的共识。在社会转型期,这种“本族意识”不仅仅被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等标识“本族”的看得见的特征强化,也有可能被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族群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族群之间或者族群内部经济利益上的差异性所强化。再次,对于第三种观点,我们认为“东突”和“三股”势力分子在南疆的影响,尤其在社会主义政权已建立六十年的新疆,其势力不比我们的政府有更大的影响力。认同本身“是个人依据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自我认同就是这种作为行动者的反思解释的连续性”(吉登斯 1998)^[1]认同的重心是自我,对自我的研究。社会心理学认为“自我是大多数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的起点,我们对社会行为的理解要从自我开始”^[2]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很自我性的、基于个人内心深处认同意识,外界敌对势力对之

教唆、怂恿等做法能对其产生多大的影响作用,以至于能够在统计数据上得以明显显现,是值得商榷的。

无疑,南疆族群本身特殊的民族性、宗教性特征,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拨、鼓吹,确实是影响南疆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但是影响南疆族群认同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理论,我们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转型期等的时代特征,来分析维吾尔族群认同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我们要从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角度关注南疆特殊性。生态、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的同质性和封闭性,带来族群整体的保守性和成员之间的低差异性,决定了生活在某一区域的群体社会认知心理的高度统一。单一性的族群习惯和族群特征,叠加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封闭性与滞后性上,就变成了较高的直接认同。南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自然环境和地理交通的封闭性、单一性、保守性使得全球化、现代化的趋势对这里“鞭长莫及”。南疆是绿洲生态型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远远落后于我国发达地区,甚至是北疆地区。截止 2007 年末,南疆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为 13870 元(不含喀什地区),为北疆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 41%;其中和田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为 3405 元,为北疆相同指数的 10%。^[3]恶劣的地理交通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封闭地区参与现代化的困难,使得在同一国家制度体系下相对落后的地区或族群更容易受到传媒的刺激而产生比较性劣势心理而导致认同强化。在社会转型期,比较性的认同强化很容易借助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而转化为群体事件。南疆的发展与应对行为的表现须专门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出南疆发展的科学决策。

一、地理、聚居、同质性

新疆按照地域划分,可以分为北疆、东疆和南疆,天山山脉和昆仑山山脉之间的广大区域就是新疆的南疆地区,地理环境呈现出板块性、封闭性和单一性。南疆整体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是世界上离海洋最遥远的地方。天山山脉由北向西南延伸,最终与南端的昆仑山脉接壤,把整个南疆包围在其中;南疆东面是举世闻名的河西走廊和可可西里大荒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横卧于此,高山、荒漠把南疆隔绝在欧亚大陆的最封闭地区。南疆不仅整体上是一个内陆封

闭地区,在这个大的封闭生态圈内,存在着沿着水流而形成的冲积扇平原绿洲。它们被沙漠戈壁分割成互不相连的小块,像分散在沙漠中的绿色珍珠,而串起这些珍珠的是季节性冰雪融水。这些绿洲主要分散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彼此之间被几十上百公里的沙漠隔绝,以和田地区皮山县为例,全县分散在 50 多个小绿洲之上(有的绿洲面积小到仅数公顷)。在南疆大大小小的绿洲上生活着 951 万各族人民,其中 80.15% 是维吾尔族,占全疆维吾尔族人口的 79%,高于维吾尔族占全疆人口 46.06% 的比例,更高于北疆 13.13% 的比例,可以说南疆是我国最大的维吾尔族聚居区。

南疆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板块性,和族群的单一性使得生活在南疆一个个绿洲的人们生产、生活具有同质性。地理上的封闭性使南疆族群独具特色的文化属性像活化石一样在南疆一个个绿洲保存下来,成为南疆维吾尔族群共同的族群文化和族群特征。在千百年的发展,绿洲农耕社会的板块性、封闭性和单一性成为保护南疆族群文化的天然屏障,使得周边文化在陆上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对南疆族群的影响非常小。截止 2007 年末,南疆五个地州除维吾尔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人口比例为 19.75%,其中和田地区为 3.67%,喀什地区为 8.86%,而且这些民族大多生活在城市,或者在偏远的高山、草原,在广大农村地区与维吾尔混居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可见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南疆地区来说,其他民族文化对维吾尔族群的影响很少。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保守性,自然地隔绝着南疆族群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绿洲族群传承着共同的文化,使用共同的语言文字,面对着共同的生态环境,追求着同样的精神信仰,所有的这些都通过物质与精神的作用和反作用转化成为维吾尔族群生产、生活、习俗等高度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不仅表现在相同的语言、文化、宗教等的同质,更表现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质,而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质性导致族群成员对自己相对封闭的群体直接认同度较高,和族群成员彼此之间社会认知心理的低差异性。

南疆曾经是欧亚大陆丝绸之路上民族商贸、远方游客云集的地方,东西方文明在这里汇聚、传承、发展,聚居于此的维吾尔族就在这样的融合中形成、发展、壮大。随着工业革命和航海时代的到来,海洋文明逐渐替代了农牧文明,南疆也渐渐淡出了世界现代化文明发展的舞台。现在的南疆远

离全球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蓝色文明”区域,变成了相对封闭、保守的地区。恶劣的地理交通和生态环境严重限制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生产资源和人口的流动,造成南疆各个绿洲参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困难,越往南疆内陆地区这种趋势越加明显。由于绿洲的分散性和环境资源条件的制约,绿洲农耕经济的规模化效应很难实现。南疆耕地面积仅占南疆总面积的 1.23%,年均降雨量仅为 43.8 毫米(其中和田地区仅 23.8 毫米),恶劣环境中的南疆农耕土地上,平均每平方公里耕地要养活 728 人,在技术相对落后的农耕生产条件下,农耕族群成员之间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显示出低差异性。南疆长久以来形成的自给自足的单一农业小生产为主导的产业模式,使生活在这里的族群“不患寡患不均”、“小富即安”的思想根深蒂固。南疆绿洲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结合维吾尔族群同质性的文化、信仰、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反映出南疆族群应对自然生产而表现出来相同的族群习惯和族群特征。封闭区域内生产和生活水平表现出低差异性的、高度一致的族群习惯和族群特征投射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显现为人们相同的社会认知,和潜意识的对本族群成员之间几乎无差别经济状况的维护心理。

南疆族群长期的封闭性势必导致对其他族群显示出来的一定的距离感,但是现代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定制,南疆族群这种基于地域性的族群成员之间无差别的保守主义社会认知,面对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带来的各式各样的,例如区域间、不同族群间贫富悬殊、生产资源不均衡分配、失业等的社会问题冲击时,就会产生同一国家体制下的“社会边界”感而使本地族群的认同感增强。这种“社会边界”感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族群互动过程中产生,被族群之间或者族群内部经济利益上的差异性所强化,使族群成员形成族群整体处于社会利益分配边界的群体性社会认知。而这种群体性的社会认知一旦扩大就可能借助民族的或宗教的外衣而转化成为群体事件。但是以常态的多族群共同生活、生产、共居一地的历史上来看,维吾尔与其他民族的和睦相处是主流和常态,只是一般的现代化进程中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问题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出现族群排斥现象。

二、比较性认知的认同强化

“族群认同”(ethnic group identity)是社会认

同理论在少数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发展。人们会用自己或他人的某些社会群体成员资格来建构自己或他人的身份。按照社会认同理论的说法,社会认同是个体对其所归属的群体或类属的认知和信念。社会认同理论强调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社会类化(social categorization)过程。通过社会比较过程,个体将知觉对象分成两类:与自己相似的个体和与自己相异的个体。他们将与自己相似的个体归结为内群体(in-group),并为其贴上内群体的标签;将与自己不同的个体归结为外群体(out-group),并为其贴上外群体的标签。一旦个体对不同的知觉对象贴上内群体或外群体的社会标签,社会类化也就完成了。强化某一族群的因素,不仅有文化的、语言的、宗教的、习俗等的一致性,更应该包括族群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感受到的共同的社会边界。

当代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研究分析新疆维吾尔人的族群认同,强调了族群的语言、文化、宗教等的特征对族群认同的影响,而忽略了造成族群最主要的“边界”不是其语言、文化、宗教等族群“内涵”要素,而是族群存在的“社会边界”——社会某一群体在社会利益分配过程中感受到的群体性社会认知和心理反应。我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影响族群认同的因素也是多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南疆各族群之间生产技术、制度、资金上分配、占有上的不平衡而导致生活上经济利益的不平衡,这种生产和生活上的利益差距使本地族群成员参照其他族群利益得失而产生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而这种群体性的不公平感觉和南疆本地族群同质性的社会认知发生碰撞,产生了鲜明的族群之间的比较性认知,而这种比较性认知扩大,强化了南疆本地族群认同意识。

我国的西部开发已经进行了十年年头了,如果把祖国的最西边和最东边进行比较,其中的差距是非常惊人的。由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南疆主要的经济产业是农业,但是土地沙化严重,人均可耕种土地面积少,发展农业现代化的成本高。由于远离现代文明,南疆道路运输成本极高,南疆广大地区除了大型央企石油化工企业和不成规模的地区小工业之外,民间基本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产业。而这些地区小工业创造的经济价值很小,没有对其他所属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方面的民族优惠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

就业、医疗、升学、住房、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实施,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发达地区的公民携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技术、制度身份或资本进入南疆地区进行投资、购买经营权、开发权,这确实有效地促进了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近二十年来,南疆与历史上自身的发展速度相比尽管有了较快发展,但与内地多数省份对比,南疆与北疆相比,南疆的农村与城市相比,发展水平或发展速度差距明显,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差距没有缩小,个别地方还有所扩大。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诸如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各种社会不平等(如经济利益、政治待遇、生活环境、发展机遇等)等新的社会问题又出现了,而这些社会问题与差异遭遇南疆这样经济落后、封闭、保守的区域和具有较高直接认同和统一社会认知的族群时,就有可能表现为本地族群与外来族群之间的差异与问题。社会学“相对剥夺理论”认为,当社会中的某一群体,把自身利益与参照物利益进行对比,来评价和判断自身利益的得失时,若认为自己比参照物得到的少,就会产生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认为自己本该得到的东西被他者“剥夺”而没有得到。恶劣的地理交通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南疆板块性绿洲参与现代化的困难,使得在同一国家制度体系下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南疆地区本地族群更容易受到传媒的刺激而产生群体性的比较性劣势心理。

国家为了加快发展地方经济,自新中国成立开始,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每年调拨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先进的生产力要素支援南疆发展经济。很自然的,与封闭、保守的本地族群形成对照,携带代表生产力的技术、制度身份或资本进入南疆地区的外来族群成了先进、现代等的代名词。大量外来族群的迁入引起了南疆本地族群从经济利益出发的抵触。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不仅是一个提高社会生产率的过程,更是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南疆的现代化进程中,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分享了社会大部分的经济成果,而众多的本地族群在社会改革的浪潮中,虽然从生活水平发展的绝对数来看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本地族群会在与“精英集团”的迅速发展的对比之下产生“相对剥夺

感”,并且认为自己处在主流社会利益分享的边界。例如,现在南疆各地,装修精致、服务一流的第三产业、服务行业的宾馆、酒楼、会所、健身场馆等随处可见,有些还结合当地的民族特色,推出特色服务项目,深受南疆各界群众的欢迎。可是,由于技术、资金等资源的差异,南疆本地维吾尔族很少能经营这么大规模的商业设施、旅游设施,而那些较大规模的商业设施均由内地转移资本经营,他们享受着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益。本地维吾尔族由于技术欠缺、资金缺乏,很少能经营那样的经济实体,而来自内地的流动大军基本充斥这些外部输入项目的岗位,其本土就业比率不大,这引起当地维吾尔族的不满。我们在阿克苏考察时发现,陕西人、湖南人、四川人开的维吾尔族特色饭馆,如抓饭馆、拌面馆、烤羊肉串摊随处可见,本地少数民族认为这本来应该是南疆本土族群文化的“特色专利产业”,但是外来者逐渐占据了当地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岗位。由于外来者同样可以利用传统资源,又兼具外地的资金、技术、人脉等资源,所以本地族群在传统服务行业占据重要优势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就会产生由于边际劣势从而产生对外来市场力量的放大型抱怨,主要变成了容易被误导的“外来者就是汉族、汉族就是外来者、外来者抢走了我们的饭碗”等。

南疆族群之间比较性劣势产生之后,南疆的“群众”就慢慢转化成为了不同的“群体”。我们在南疆发现,涉及社会的主要族群,本地人的话语体系中更多的是使用“我们”、“他们”等词语来标识“本族群”与“他族群”的不同,这种族群之间的认同范围已经超越了普通族群认同当中的语言、文化、宗教等要素。本地族群的社会边界感日渐突出,社会认知针对社会系统分出“他”、“我”两极,看待社会问题会有两极化的思维方式,信息会出现单边选择,“坏事都是对方干的”“如果没有他们我们本来可以更好的”等等。这极易产生封闭地区本地族群的群体盲动,滋生不利于本地和谐稳定的心理因素,本地族群的比较性认同强化将可能借助在社会转型期产生的社会问题而转化为族群之间的群体事件。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得到社会的帮助才能生存下去。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地区,传统的人类社会总会有一套适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于家庭亲属、友情关系、信仰依赖、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转

型期,尤其是在落后的民族地区,新、旧社会规范和新、旧分配机制同时起作用,贫富差距分化明显,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认为自身利益分配处于劣势的群体)很容易在心理上产生自己利益被他人剥夺的感受,如果这种群体性的心理认同不及时疏导,就有可能引发对社会的强烈不满,进而采取群体性社会行为,危害社会稳定。“如果政府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候忽略了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平等发展,则往往会在经济高速发展、旧的传统社会组织逐渐丢失和解体、贫富明显分化的同时,造成一部分人的被边缘化并因此而产生无助、失落、绝望甚至对社会的仇视。”^[4]哈佛大学社会学家沃特斯说:“族群认同是一个历史变量,影响其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社会流动(社会垂直流动,从低层流动到较高阶层)。只要种族或族群认同与阶级分层有关,或者只要社会报偿的分配取决于先赋的族群身份,利益受损族群的认同将比那些有权选择、可从认同中获益的族群的认同更为复杂,也更易引发冲突。”^[5]

三、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启示

族群认同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民族地区的族群认同对社会稳定起着预警、调节、保障等作用。在中央实行改革开放 30年后,我国城乡所有制结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民众思想观念也正处在一个深刻变革的转型过程中。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影响族群认同的因素不仅是传统社会学研究的语言、宗教、习俗等,同样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其次,在分析了南疆族群认同的根源之后,如果我们把主流观察者或者主流决策者们的关于预

防和解决南疆群体事件或者宗教事件的具体政策或行动称作治标之举的话,似乎加快南疆的经济发展,让民族地区的普通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治本之道。我们建议政府加大制度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建立双向流动的市场和制度支持通道、加快公民社会的建设等。但是,我们追问,这些政策的实施能否从实质上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能否帮助民族地区因地制宜的培育适合自身发展的“造血功能”而不依赖中央调控?社会稳定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在现代化大发展的浪潮中,我国各民族之间到底有没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如果有差异,那么我国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形成机制是什么?“社会边界”因素只是南疆族群认同强化的特殊案例还是全国落后民族地区的普遍现象?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解放思路地从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才能解决好关乎我国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 [1] 张向东. 认同的概念辨析[J]. 湖南社会科学, 2006(3).
- [2] 杜加克斯等. 八十年代社会心理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65.
- [3] 新疆统计局. 新疆统计年鉴 2008[M]. 新疆统计出版社, 2008.
- [4] 杨圣敏. 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是什么——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案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5).
- [5] 马忠才. 族群认同的力量——读沃特斯《族群选择》[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7).

收稿日期: 2009 - 12 - 01 责任编辑 孙国英